

# 邺 城

## ——中国、亚洲与世界城市史研究中的一个谜

牛润珍

【摘 要】邺城城制布局规整,讲究对称,影响及于隋唐大兴、长安与明清北京,并被日本、韩国、朝鲜、越南等国古都模习,为世界古代“华夏型”城市起源之一。邺城遗址已沉埋于地下千余年,结合文献与考古资料,探讨邺城始置、地名由来、周围地理环境、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史籍有关记载、古今中外学者研究状况,有助于解开邺城之谜,揭示中世纪东亚都城制度的源流。同时,又可由邺城三经兴衰的历程,总结城镇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历史经验,为现代城市规划、建设提供借鉴。

【关键词】邺城;城市制度;华夏型城市

【中图分类号】K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873(2009)03—0012—09

【作者简介】牛润珍,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100872

十多年前,中国的《参考消息》(1991年6月25日)刊载了日本共同社一则电讯,题曰《为解开日本都城建造规制的起源之谜——中日联合发掘“邺城”遗址》,言称:“日本方面将派遣研究人员与中国方面联合发掘河北省的“邺城”遗址,据说邺城是日本古代都城的源流之一,发掘这一遗址的目的是为了揭开平城京(奈良市)等日本都城建造规制的起源之谜。”这一国际联合研究计划并未实施,虽未践行,但至少说明日本学界对于揭开邺城之谜渴望已久。

2008年5月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访问日本之“暖春之旅”,曾赴京都冒雨参观了复建的平城京朱雀门,日方学者向胡锦涛主席介绍平城京是仿唐代的长安城建造的。然唐代的长安城沿承隋之大兴,隋之大兴又借鉴了东魏北齐邺南城,邺南城之建造又兼习北魏洛阳与曹魏之邺北城,因此,中日学者大多认为邺是日本古都城制源流之一。

邺城城制,特征鲜明,平面布局甚为规整,讲究对称,主要建筑沿南北中轴线布置,宫城、郭城“回”字形相套,街区呈棋盘状,这一制度不仅影响了隋唐的大兴、长安,还影响到明清的北京。南北朝时期,高句丽采用这一城制,设计建造了平壤城。到了唐代,日本仿长安城建藤原京,也贯彻了此项制度,以后的越南阮氏王朝同样借鉴此城制布置都城——顺化,由此构成了整个世界古代城市“华夏型”基本特征。自公元580年,杨坚将邺付之一炬,历史名都邺城变成一片废墟,历经1400多年风雨剥蚀、漳水冲淤,邺墟渐渐被淹埋于地下2—10余米。由于文献散佚严重,有关记载少而乱,考古调查又很难大规模发掘,邺城基本面貌就像一个谜一样,长久困扰着中外学术界。因而,破解邺城之谜,也就成了中国、亚洲及世界古代城市史研究上的一个疑难问题。

当然,欲解决这一疑难问题,需付出长期艰苦的努力,研究工作应逐步推进,特别是一些相关的基础研究,诸如邺城始置,地名由来,周围地理环境,其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史籍有关邺城之记载,古今中外学者对其的研究情况,等等。这些问题的清理与探讨,对于破解邺城之谜是十分必要的。

鄆城,始置于齐桓公。《管子·小匡》曰:齐桓公“筑五鹿、中牟、鄆以卫诸夏之地”。明嘉靖《彰德府志》卷2《地理志》引《城塚记》曰:“狄灭邢、卫,齐桓公筑鄆城以卫诸侯。”《城塚记》疑为《汲冢记》,狄伐邢,时在公元前662年,次年,齐救邢,鄆城之筑当在此年或以后。其地望是否即今鄆城遗址,文献无明确记载。关于鄆之地名起源,可从“鄆”之字形字源上推断,鄆从业从邑,根据约斋《字源》的解释,“业”繁写为“業”,从业从木,为草木茂密成簇丛生的象形;“卩”同“阜”,阜即较高三层土山的形象。“卩”又同“邑”,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卷6下邑部释“鄆”,曰:“魏郡县,从邑业声。”由字形字源推知鄆之地名,又由地名推断鄆之初建,其地当在地势较高草木茂盛之土丘上。至于桓公所筑鄆城形制、建筑,已不可考。

南朝宋裴骃《史记集解》卷7《项羽本纪》转引《汲冢古文》曰:“殷墟南去鄆三十里。”今鄆城遗址南偏西约30里即殷墟,从两处古遗址的距离与方位看,《汲冢古文》的记载大体正确。《汲冢古文》是西晋太康二年发现于魏襄王(或曰魏安釐王)墓中的文献,又称《汲冢书》,所记鄆即战国时期魏国的城邑,其方位即今鄆城遗址。《水经注》卷10《浊漳水》曰:“(鄆)本齐桓公所置也……后属晋,魏文侯七年始封此地,故曰魏地。”又曰:“魏文侯以西门豹为鄆令也,引漳以溉,鄆民赖其用。其后至魏襄王,以史起为鄆令,又堰漳水以灌鄆田,咸成沃壤,百姓歌之。”《战国策·魏国》、《史记》卷126《滑稽列传》、《汉书·沟洫志》、西晋左思《魏都赋》等都记有西门豹、史起治鄆之事。魏晋以前文献所记鄆城,地址均在今鄆城遗址,这说明自齐桓公筑鄆至魏晋南北朝,鄆城地址并未曾迁徙。

鄆城座落在太行山东麓平原一丘阜上,又称葵丘。《春秋古地》曰:“葵丘,地名,今鄆西三台是也。”<sup>①</sup>漳水自西南过鄆西而东北。齐桓公筑鄆以卫诸夏,最初的鄆城恐怕仅是驻兵的城堡,而平原地区的垒壁大多依津要而置,从鄆城附近地势看,很适宜建筑城堡。鄆西北高,临近漳水,又处在传统的太行山东麓南北通道上。桓公筑鄆,实即因丘而置,此正可凭借漳水抗拒来自北方戎狄的南侵。战国时期,魏、赵二国于鄆置县治,汉高祖十二年,置魏郡,治鄆县,王莽更名魏城,东汉灵帝时,为冀州治所,曹操封魏国,以鄆为国都。曹丕称帝,都洛阳,以鄆为陪都,以后又有后赵、冉魏、前燕、东魏、北齐等相继都鄆,鄆成为北部中国最大的都会城市。鄆城历史地位愈益重要,与其地理条件十分优越有关,其西部自北向南,太行山犹如一道天然屏障;南部由西向东,黄河构成一条“水长城”;东部由河渐海,形成南北交纵、四通八达之漕运和海运,北靠辽阔富庶的河北平原,处山、河、海、平原之间,“据河北之襟喉,为天下之腰膂。”<sup>②</sup>由远而近,白沟、淇水、荡水、洹水皆过鄆南由西部山区东北流向平原,城西北、北临近漳水,西北十五里有溢水,在鄆城周围,黄河与诸水之间又分布着黄泽、鸬鹚、大陆等陂泽,众水犹如一道道天然护城河,并由陂泽调节水量。周边关、径、津、梁、路又构成了鄆城内外交通网络,西北出溢口,过壶关,可通晋阳、长安,取道井径关、天门关可直趋并州、雁门;黄河由西而东北,白马津、仓亭津等为鄆城南下河南的门户,鄆城东有赤桥,由此往东可直下齐、鲁。

从地理险要的程度看,鄆不及长安、洛阳;若从攻守战略的意义上讲,鄆地条件优于长安、洛阳,因为其处关中、河南、河北及北方之关键部位,地理位置重要且又具有较大的游移变化空间,特别是对于来自北方的政治势力,可谓是得天独厚攻守皆宜的战略要地。春秋战国,地域政治势力的竞争呈现东西态势,关中强秦的连横与山东六国的合纵角力,在地理上形成了以关中制山东的局面,鄆与邯郸是东西两大地域势力较量的冲要地带。魏晋南北朝时期,地域势力的竞争又演化成南北对峙态势,来自北方的少数民族势力南下中原,以河北制河南,尤其是羯、氐、羌、匈奴、鲜卑等部族,跻身中原,建立政权,与汉族统治者逐鹿,欲据河北图河南以取天下。“河南古所称四战之地也,当取

① 《水经注》卷10《浊漳水》转引,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上册,第937页。

② 顾祖禹:《读史方輿记要》卷49《河南四》,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3册,第2121页。

天下之日,河南在所必争,及天下既定,而守在河南则岌岌焉有必亡之势矣……肩背之虑,实在河北……守关中守河北乃所以守河南也。自古及今,河南之祸中于关中者什之七,中于河北者什之九……夫河北之足以治河南也,自昔为然矣。”<sup>①</sup>据中原图天下,必以此为根基,建都于其地,选择何邑为都城?“以河南之全势较之,则宛不如洛,洛不如邺也……夫邺倚太行,阻漳滏,夏商时固有都其地者,战国之世,赵用此以拒秦,秦亦由此以并赵。汉之末,袁绍不能有其险也,入于曹操,遂能雄长中原。晋之衰,刘琨不能固其险也,殁于石勒,因以蹂躏司、豫。石赵之亡,冉闵不能保其险也,并于慕容儁,从而兼有山东。元魏之季,尔朱兆不能用其险也,归于高欢,因而盗窃魏柄。迨其后,尉迟迥据之以问罪杨坚,则远近震动……夫自古用兵,以邺而制洛也常易,以洛而制邺也常难。”<sup>②</sup>曹魏、后赵、冉魏、前燕、东魏、北齐等六朝建都于此,成为其争霸天下的依托,邺在地理上为魏晋南北朝的南北对峙并在对峙中促进新的统一提供了客观条件。

无论春秋战国还是魏晋南北朝,邺地均处于东西南北交通的都会区位,这样的区位优势不仅影响了各个时期政治与军事的变化,还对社会、经济、文化等造成重要影响。特别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建立与发展,使来自北方的强大攻势,把中原较为先进的农耕经济推向江南,而少数民族在中原地区吸收汉文化,并仿效汉族政权,制定各项典章制度,转变生活方式,形成了历史上的民族融合。民族融合的主要地域在今河北省的中、南部和河南省的北、西部,而邺位居主要地域中心地带。北方部族首领占据邺城后,多定鼎于此,并称皇帝,实行比较彻底的汉化政策,后赵石勒、前燕慕容儁都在这里完成了政权封建化的过程。北魏拓跋氏占据邺城后,语言、服饰多仿中原,并数议迁都邺城。孝文帝进行民族改革,其决策就是在邺制定的,迁都洛阳,以邺为中转站,经营邺宫,访问风俗。迁洛后,重用山东汉士,改汉姓,用汉语,著汉服,鲜卑拓跋氏逐渐融入华夏民族。北周灭北齐,武帝入邺,礼重儒贤,迁山东衣冠士人入关中,聚拢人才,使北周愈益强盛起来,北方诸部族政权居邺前后变化,说明这里是北方部族与华夏民族融合的关键地带。

民族融合的态势基本上是由北向南,主要形式是大迁徙。边地饥荒,大批饥民内徙就食。更多的是战争移民,中原每乱,北方诸部族乘机南下,占据河北,并定基于此,向南开拓境地,向北掠夺人口。西晋八王之乱,鲜卑、羯诸族兵众南掠中原,迫使晋室迁徙江南。以后,石勒据有中原,攻靳准,徙羌、羯降者10万落于冀州;又破上邽,灭前赵,徙其台省、关东流民、秦雍大族9000人于襄国,氏羌15万落于司、冀二州;平关中,徙秦雍民及氏羌10余万户于关东。石赵时期,邺都与冀州两地少数民族部众人口不下30多万。不久,石赵大乱,河北流民20万渡河归晋,继而冉闵戮胡,氏、羌、羯诸族死者20多万,司、冀二州氏、羌流民也相率西归,众至10余万。以后,苻坚徙邺士民4万余于长安,苻丕又徙邺民户6万于晋阳,继之,慕容德又徙邺户4万于滑台。人口迁徙总方向是由北向南,但由于北方诸部族政权并立,相互混战,战争又多以掠夺人口为目的,形成了人口伴随各自都城的兴衰而聚散。魏晋南北朝,北方诸强争夺的重点在河北,因此邺也就成了各族人口的聚散中心。

由于邺城地理位置重要,交通便利,水利条件优越,传统农业经济发达,人口殷盛,故魏武帝曹操于此置都,营造城池。西晋末,汲桑焚邺,魏晋名城被毁;后赵石勒、石虎兴建邺城,并迁都于此,冉魏之乱时,邺城受到一定破坏,以后又有前燕都邺,邺城再次兴盛,到前秦陷邺,灭前燕,直到北魏,一度衰落;东魏迁都于邺,北齐继之,修复北城,新建南城,邺都鼎盛。北周灭北齐,杨坚徙邺民,毁邺居,从而衰竭。邺城三经兴衰,于公元580年被彻底焚毁而变成一片废墟,昔日繁华尽荒凉,残垣断壁也逐渐被黄沙蒿莱掩埋,沉寂于地下千余年。

### 三

由于邺城遗址逐渐被漳水冲淤掩埋,后人对其地理方位的标识往往以其时某一行政建置为参

①② 顾祖禹:《读史方輿记要》卷46河南序,第2册,第1909、1911页。

照座标原点,然历代行政区划常有变更,因而各家所标道里方位不一。《三国志疆域志》、《三国志疆域志补注》、《大明一统志》卷28云:“邺县,在临漳县西二十里。”《大清一统志》卷159、曹学佺《名胜志》:“邺城,宋废为镇,去临漳县西二十里。”顾祖禹《读史方輿纪要》卷19邺城:“今俗名故邺城曰邺镇。邑志云,今县城……去故邺城,几四十里。”杨守敬《隋书地理考证附补遗》卷3:“邺位于临漳县西南四十里。”《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邺故城在今河南临漳县西四十里。”明嘉靖《彰德府志》卷8:“邺城北城在(邺)镇东南一里半。”《辞海》:邺故城“在今河北临漳县西南邺镇东一里半。”

诸书确定邺城方位多以临漳县或邺镇作参照;以临漳县城作座标原点,或曰西20里,或曰西40里,或曰西南40里;以邺镇为参照,或曰在镇东南一里半,或曰东一里半。邺镇,北宋置。东魏曾置邺县,治所在邺城中。北周大象二年(580),杨坚焚邺,将相州、魏郡、邺县治所西南移45里至安阳城,改安阳为邺,于邺故址置灵芝县。隋开皇十年(590),复安阳旧名,灵芝县改名邺县,治所在邺故址大慈寺一带,唐贞观八年,始筑邺县治小城。《旧唐书》卷39《地理志》:“炀帝初,于邺故都大慈寺置邺县,贞观八年,始筑今治所小城。”北宋熙宁五年(1073),罢废邺县置镇,隶属临漳县。《宋史》卷86《地理志》“临漳县”:“熙宁五年,省邺县入焉。”<sup>①</sup>据嘉靖《彰德府志》卷2《地理志》:“(邺镇)在府东北三十里。”彰德府治安阳,安阳东北36里即邺故址。如此,邺镇应在邺址之南,而不能以东南或东标方位。也有可能隋唐之邺县治所在故址之西北,宋以后邺镇曾南徙,嘉靖《彰德府志》照抄宋《相台志》,沿袭宋人说法。同书卷9《杂志》于村名不载邺镇,而列有北邺城、南邺城,邺镇也有可能在宋元以后一度消废。今之邺镇位于三台遗址南,居北城西墙基上,可能是明清以后的建置,以变化的邺镇标不变的邺城遗址,自然会出现歧异。

以临漳县城标邺城遗址,也会发生歧异。东魏于邺城中置临漳县。周武帝平齐,于建德六年(577)移临漳县治于邺城东二十里,属魏郡。隋开皇三年改隶相州,开皇十年分县地置长乐县。大业十年始筑县城,北宋省邺县,并入临漳。明洪武十八年,“漳水垫民居,奏移治于东北十八里理王村。”<sup>②</sup>《大明一统志》、曹学佺《名胜志》沿袭旧说,仍曰“西二十里”。《名胜志》又曰“邺城宋废为镇”,不确切,邺城与邺镇是两回事,没有沿革关系,两者建置时间与位置不一。相对来说,杨守敬的说法是比较正确的。若以今之地理方位标注邺城遗址,应为今河北省临漳县西南约17.5公里,或曰临漳县邺镇东,或曰临漳县三台村,西南距河南省安阳市约18公里,西距京广铁路讲武城站4公里,位于北纬36°8′—36°12′,东经114°20′—114°23′,面积约20平方公里。

#### 四

邺都城郭、宫殿、官署府第、坊巷街区、台观苑池等,早已荡然无存,地面遗迹只有金凤台与铜雀台一角,及南、北城区内外散布的几处建筑台基。田野、垌亩、村庄诉说着昔日名都大邑的远逝,并引发了一代又一代人的思考和无限向往,无论古人、近人还是今人,总想弄明白历史上邺都的辉煌,辉煌又是如何暗淡并消失的,名城因何而兴,又因何而衰,等等。关于邺城的记载与研究,自魏晋至21世纪初,大体经历了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民国和新中国成立后等四个时期:

魏晋南北朝,较早记述邺城名物的文献多是地赋、地记及建安年间邺下诗文等,如曹植《登台赋》,所言层台、太府、圣德殿、高门、双阙、中天之华观及西城飞阁,还有临漳水之长流、果园,记及邺都名物有10处之多。西晋左思《魏都赋》记有漳水、邺下水利工程、三台、西苑、太武殿、路寝、听政殿、官署、街巷、四里等。曹丕《典论》、曹植《游西苑诗》,还有王粲、应瑒、陈琳等人的《槐赋》,都是邺下作品,所描绘的都是邺中风物。史书杂著则有王粲《汉末英雄记》、王沈《魏书》、鱼豢《魏略》、陈寿《三国志》、孔衍《汉魏春秋》、司马彪《续汉书》与《九州春秋》、郭颁《魏晋世语》、阴澹《魏纪》、

① 嘉靖《彰德府志》记为七年;《辞海》则记为六年。

② 嘉靖《彰德府志》。

诸家《晋书》、《晋八王故事》等,这些文献载及魏晋邺城史事名物,许多原书早已失传,残存片断,仍能反映出大致内容。《初学记》卷24《宫》曰:“魏为邺宫,见《魏略》。”想必此书记邺宫较详。

关于后赵、前燕邺城的记载,主要文献有田融《后赵录》(或曰《赵书》、《二石集》、《二石传》)、王度《二石传》(石勒、石虎)、《二石伪治时事》、陆翊《邺中记》、范亨《燕书》(记慕容儁)、崔鸿《十六国春秋》、酈道元《水经注》等。《水经注》卷10《浊漳水》记魏武、石赵邺都较详,是唯一流传至今较为完整的文献。陆翊曾仕后赵,以后南渡为东晋国子助教,结合自己亲历搜集后赵邺都文献,撰成《邺中记》2卷,专记石虎邺宫事物,宋以后散佚。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著录《邺中记》1卷,佚名氏撰。陈氏所著录的《邺中记》与陆翊《邺中记》是否为一书,二者关系如何?惜二书俱佚,已无法辨明。传世辑本以元代陶宗仪《说郛》为最早,然寥寥数页,远非完本。《邺中记》辑佚,清人最有成绩。陆锡熊、纪昀等编《四库全书》,“以散见《永乐大典》者,蒐罗荟萃,以诸书互证,删除重复,共得七十四条,排比成编,仍为一卷。以石虎诸事为翊之本书,其续入诸条亦唐以前人所记,弃之可惜,则殿居卷末,别以附录名焉。是书虽篇帙无多,而叙述典核,颇资考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史部九·载记类》)行世版本除《四库全书》本外,还有聚珍版本、续百川学海本、榕园丛书本等。此外,辑本《十六国春秋》也有记载后赵、前燕邺城的史料,然多与《晋书·载记》等书相同。北齐杨楞伽《邺都故事》、隋王劭《齐志》、崔子发《齐纪》等载有东魏、北齐邺都城池宫阙等建筑史料。

隋唐宋元时期,邺墟荒凉寂寞,枯树孤台半淹于黄沙,任文人墨客凭吊怀古,发古人之幽思,追述当年通都大邑之繁华与壮丽。如隋段君彦《过邺城诗》、唐太宗《登三台言志》、李百药《赋得魏都诗》、温庭筠《过陈琳墓诗》、岑参《登古邺城诗》、孟云卿《邺城怀古》、明王象春《登铜雀台诗》等。类书和地理总志也保存有关于邺城的文献与记载,如《初学记》、《艺文类聚》、《元和郡县图志》、《太平御览》、《太平寰宇记》、《元丰九域志》等。地方志书宋《相台志》,较系统地记载了邺都宫室,元《相台续志》承继宋志,载有邺城名物保存情况和邺墟在宋元时期的变化。这两部志书原书已佚,但其主要内容和材料被辑入明嘉靖《彰德府志》。此外,还有宋杨樵《临漳县志》,惜此书早佚,所载邺城诸事不详。记述元代邺城废墟情况较为详细的是酒贤《河朔访古记》,有传本行世,甚有价值。

明清民国时期,有关邺城的研究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文献的辑佚与整理。明嘉靖《彰德府志》以宋《相台志》和元《相台续志》为蓝本,于卷8《邺都宫室》,照录了宋元人对邺城建筑的记述。清初顾炎武撰《历代宅京记》,辑录了嘉靖《彰德府志》有关节目。清人辑《邺中记》甚有成就。二是校注《水经注》,根据其记载复原并绘制邺城图。如清汪士铎《水经注图》所绘《邺城图》;杨守敬《水经注校》所绘《邺城图》。这两张邺城图虽都不准确,因其较早,仍不失其一定的历史价值。三是学术研究与邺城遗址考古调查。清初顾祖禹撰《读史方輿纪要》,论述邺城的军事、政治、地理的重要性及历史地位,开邺城研究之先河。邺城考古调查始于民国时期。1931年春,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组织师生到冀南豫北考察历史古迹,洪业、顾颉刚等到河北大名、魏县考察清代崔述行迹,也曾任邺城一带作过调查。1936年北平研究院营造学社刘敦桢等调查河南省北部古建筑,曾踏察邺城遗址。刘敦桢著《中国古代建筑史》,根据文献和实地调查,绘有曹魏邺城复原图,比较接近史实,对于后来的邺城研究起了一定的参考作用,日本学者上田早苗、韩国学者成周铎在他们的论著中都引用了刘敦桢的复原图。此外,马丰撰有《赴磁县武安县南北响堂寺及其附近工作报告》(刊《北平研究院院务汇报》7卷4期,1936年7月),是为邺城附近历史古迹调查与研究。

新中国成立后,邺城研究成为历史学和考古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1961年,河北省人民政府将邺城遗址列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7年又列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57年俞伟超等对邺城遗址进行了建国后第一次考古调查,撰有《邺城调查记》,刊于1963年《考古》第1期。1976年8月至1977年12月临漳县文化馆对邺南城进行调查和考古钻探,撰有《邺城考古调查与钻探发掘简报》(刊《中原文物》1983年第4期)。1979年临漳县文物保管所成立,文保所驻三台遗址,继续开展邺城遗址考古调查,发掘采集邺地文物数千件。198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河北省文物研究所联合组建邺城考古队,于是年秋开始对邺城遗址的全面调查和钻探。经过20多

年的考古研究,相继发表了《河北临漳邺北城遗址勘探发掘简报》(《考古》1990年第7期)、《河北临漳县邺南城朱明门遗址的发掘》(《考古》1996年第1期)、郭义孚《邺南城朱明门复原研究》(《考古》1996年第1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科技实验研究中心《邺南城出土的北朝铁甲冑》(《考古》1996年第1期)。此外,还有乔文泉《邺南城附近出土北朝石造像》(《文物》1980年第9期)、徐光冀《邺城遗址的勘探发掘及其意义》(《文物春秋》1989年创刊号)、《曹魏邺城的平面复原研究》(《中国考古学论丛——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建所40周年纪念》,科学出版社1993年)、《邺城考古的新收获》(《文物春秋》1995年第3期)、张子欣《邺城铜雀三台》(《文物天地》1985年第2期)、马忠理《北齐兰陵王高肃及其碑文述略》(《中原文物》1988年第2期)、《邺都近邑北齐佛教刻经初探》(《北朝摩崖刻经研究》,齐鲁书社1991年)、王复生《从出土文物话邺城独特的城建设施》(《北朝研究》1996年第2期)、李裕群《邺城地区石窟与刻经》(《考古学报》1997年第4期)等。邺城考古与文物研究是揭示古邺真实面貌重要途径,虽已取得不少成绩,但仍有宽广的工作空间,中国未来数十年的考古研究,邺城考古还将是一个深受关注的重要课题。

邺城的历史研究始于改革开放时期,起源可追溯至“文革”后期的“评法批儒”。1974年全国大讲“儒法斗争”,西门豹被说成是法家人物的代表,“西门豹治邺”的故事广为传播,一些学者由此关注邺城,再加上邺城附近东魏、北齐墓葬发掘与考古发现,邺城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注意。1976年以后,邺城研究便成了学者探讨的课题。1978年秦佩珩在《郑州大学学报》第4期发表《邺都琐考》,次年又在《河南文博通讯》第1期上刊出《邺城考》,邺城研究由此逐渐热起来,论文越来越多,如张之《邺城兴废考》(《中州今古》1983年第3期)、张平一《古都邺城述略》(《河北学刊》1983年第1期)、《从文献看古都邺城的兴废》(《文物春秋》1989年创刊号)、周一良《读〈邺中记〉》(《内蒙古社会科学》1984年第4期)、高敏《略论邺城的历史地位与封建割据的关系》(《中州学刊》1989年第3期)、江达煌《论殷邺一体与两个古邺城——兼及东魏邺南城》(《北朝研究》1990年第1期)、邹逸麟《试论邺城兴起的历史地理背景及其在古都史上的地位》(《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5年第1期)等等。这些论文重点论述了邺城兴衰及其历史地位,特别是周一良先生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撰《魏晋南北朝史札记》,书中《魏书札记》有“中山邺信都三城”一条,论及邺城之重要,以后撰《读〈邺中记〉》,通过释读辑本《邺中记》,论述了邺城在历史上所起的重要作用。文末附有田余庆、祝总斌二先生讨论函。高敏先生的论文也颇有特色,都是邺城研究的佳作。

邺城城制及其在中国古代都城史上的地位也是研究的重点与热点。1939年陈寅恪撰成《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礼仪”一节附“都城建筑”,提出“邺——大兴——长安”中古都城系统,这对邺城制度研究具有开创之功。数十年之后,这一问题得到了深入研究,主要论文有俞伟超《中国古代都城规划的发展阶段》(《文物》1990年第2期)、吴刚《中国城市发展的质变:曹魏的邺城和南朝城市群》(《史林》1995年第1期)、朱海仁《略论曹魏邺北城、北魏洛阳城、东魏北齐邺南城平面布局的几个特点》(广州市文物考古所编《广州文物考古集》,文物出版社1998年)、王维坤《试论中国古代都城的构造与里坊制的起源》(《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9年第1期)、《论20世纪的中日古代都城研究》(《文史哲》2002年第4期)、秦建明《中国古代都城西北高台建筑之谜》(《文博》1999年第1期)、程义《试论邺北城的设计思想、布局与影响》(《西北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郭济桥《曹魏邺城中央官署布局初探》(《殷都学刊》2002年第2期)等。谭其骧先生对邺城在中国古都史上的地位也有论述,他在1984年中国古都史学术讨论会上指出:“邺城在中国古都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历史上邺的地位远比杭州重要,六大古都应为七大古都。”(见卫家雄《一九八四年历史地理学研究概述》,刊《中国史研究动态》1985年第1期)。邹逸麟在其论文中也论述到邺城在古都史上地位。

关于邺城制度及其影响。郭湖生《魏晋南北朝至隋唐宫室制度沿革——兼论日本平城京的宫室制度》(刊《中华古都——中国古代城市史论文集》,台北空间出版社1997),认为魏晋南北朝的宫城布局为并列制,由北齐邺南城开始至隋唐才正式被中轴对称制所取代,日本平城京的宫城制度似乎更接近于南北朝的制度。2000年,他在《建筑师》第95期(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发表《论邺

城制度》将曹魏都邺至五代后梁都汴约 700 年都城制度的发展概括为“邺城制度”。这一制度的特点:(1)宫前东西横街直通东西城门,划全城为二,宫城在北且于北城垣相接,坊里、衙署、市在南;(2)礼仪性大朝与日常政务的内朝在宫内并列,形成两组宫殿群,各有出入口。认为邺城制度影响了北魏、东魏、北齐和周边国家与渤海和日本诸京等一系列都城建设。

由于邺城研究愈益受到重视,学术界还开展了一些较有影响的学术研究与交流活动。1987 年 5 月日本京都大学教授谷川道雄、吉川忠夫,奈良女子大学教授上田早苗,东北大学教授安田二郎,大阪市立大学教授中村圭尔,三重大学非常勤讲师高木智见等 6 位学者以“地域社会在六朝政治文化上所起的作用”为题,与中国学者开展国际共同研究,并一起考察了邺城遗址。这次共同研究的成果,由谷川道雄编成《日中国际共同研究:地域社会在六朝政治文化上所起的作用》(1989 年 3 月京都玄文社出版),收录了上田早苗的专文研究《后汉末期的邺地与魏郡》。

1988 年 9 月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河北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河北省史学会与邯郸地区有关单位在邯郸市共同召开“全国第二届北朝史学术讨论会”,重点探讨邺城历史并考察古邺遗址。会议部分论文结集《邺城暨北朝史研究》,河北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收录了黄惠贤《魏晋南北朝时期邺都铜雀三台考》、郭黎安《魏晋南北朝邺都兴废的地理原因》、马志冰《魏晋南北朝时代邺都兴起的历史原因》、江达煌《邺城的几次重大营建与破坏》、刘岩《盛时邺城的经济文化与城市建设》等。

1991 年 4 月全国第三届建安文学学术讨论会在邯郸市召开,与会学者重点探讨了邺下建安文学,并考察邺城遗址,出版《建安文学新论》(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1 年),收录有傅刚《邺下文学论略》、胡大雷《邺下文学集团考》、李彬凯、石云涛《试论邺下文人集团的形成》等论文。这些学术活动对于推动邺城研究的深入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邺城研究同时还是国际学术上的一个重要课题。西方学者研究世界城市史,将历史上的都市划分为不同类型。中国、日本、朝鲜、越南等国的古都有相似相类的特征,因而被概括为“华夏型”。关于“华夏型”都市的起源与形成,日本学者将之追溯于曹魏时期的邺城。自 20 世纪初著名古代建筑史专家关野贞提出长安或邺城是日本古代都城的“祖型”,那波利贞、志田不动庵、宫川尚志、村田治郎、驹井和爱、秋山日出雄、岸俊男、谷川道雄、上田早苗、中村圭尔等学者都探讨了邺与日本古都之关系,将日本古都城制溯源于长安或邺。20 世纪 30 年代,水野清一等编有《世界美术大全》和《响堂山石窟》,《美术大全》载有曹魏邺城石螭首照片,日本学者此前当考察过邺城遗址。

1930 年那波利贞发表《从中国首都规划史的角度探讨唐长安城》(《桑原博士还历纪念东洋史论丛》),根据《考工记》的都城规划理念和《文选·魏都赋》注的材料,考察了邺城的布局形制的发展及其与隋之大兴、唐之长安规划建造的关系。1938 年村田治郎在《建筑学研究》杂志第 89 号上发表《邺城考略》。昭和五十六年又将旧稿重新修订,收入《中国的帝都》,列为第 2 章,叙述了邺城的历史沿革、城廓、曹魏、后赵、东魏、北齐之宫殿、官署、三台及苑囿,探讨了诸政权择邺为都的原因。“村田的论文已经成为日本邺城研究中的必读文献。”<sup>①</sup>岸俊男是研究中日古都的健将,成绩卓著,出版有《日本の古代官都》(NHK 大学讲座 1981 年)、《日本の官都と中国の都城》(《都城》1976 年)、《古代官都の探究》(塙书房 1984 年)、《日本の古代・都城の生態》(中央公论社 1987 年)等论著。秋山日出雄《日本古代都城制的源流》(刊于昭和五十六年六月《历史研究》第十九号)将日本的藤原京与邺城、藤原京之飞鸟宫与邺南宫作了比较研究。其另一篇论文《八省院=朝堂院の祖型》(刊于 1981 年 3 月财团法人大阪市文化财协会刊《難波宮址の研究第七》论考篇),对邺南宫的构造、朝堂作了研究,认为邺南宫的朝堂是日本藤原京八省院的祖型。他还曾试图通过邺南城复原研究,揭示日本古都城制原型,于 1982 年在《女神大史学》第 2 期上发表《日本古代都城制的原型》。上田早苗《后汉末期的邺地与魏郡》,探讨了魏武都邺的条件及邺在中国都城史上的地位,指

① 中村圭尔:《日本魏晋南北朝城市研究史》,见中村圭尔、辛德勇编《中日古代城市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47 页。

出：“邺京不仅为日本‘大藤原京’及平城京两京之祖型，在中国都城史上，也占有极重要的地位。”

日本学者对于邺城的研究应该说始于20世纪初，2、30年代出现有份量的成果，70年代以后形成研究热点。中村圭尔先生说：“自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日本学者对邺给予了更多的关心。掀起这个研究热潮的是岸俊男，他反对日本平城京受隋唐长安影响的旧说，认为日本都城的原型是藤原京，藤原京呈南北长、东西窄的布局，这种布局与东西长、南北短的长安不同，其布局应该是来自南北长、东西短的北魏洛阳城或邺南城。受到这个观点的触发，在20世纪80年代，日本史学者秋山日出雄提出了关于邺的独特见解。秋山首先以村田的学说为主要依据，参考《邺中记》、《邺都故事》中的记载，指出邺南宫的太极殿、东西堂、朝（应为“昭”）阳殿、永巷等的布局与日本飞鸟宫的平面布局几乎相同，他认为飞鸟宫的设计受到了邺南宫的影响，飞鸟宫的设计又影响到藤原宫。他还分析了邺南宫的规模、城门、官署等，认为邺与隋唐洛阳可能比较相似。”1982年“秋山又发表了关于邺南城复原的专论。这个论文（即《日本古代都城制的原型》）以村田的研究为基础，首先据文献尝试复原了邺南城和邺北城。据《历代宅京记》确认了城郭的规模、郭和市、里坊等。其次用他自己称为历史地理学式的方法来推定邺南城的形态和位置。他主要根据邺周围的水路和道里对南城的形态和位置进行了推定。根据他的推测，邺南城和邺北城南墙间有20度的夹角。这个推测和后来的考古调查发现的邺南城的形态和位置大相径庭。”<sup>①</sup>

与日本学者一样，韩国学者的邺城研究，重点也在都城制度方面。韩国国立庆州文化财研究所重大考古成果《庆州王京》（遗物图版1册，2001年版；本文1册，2002年版），将新罗王城与邺作了比较。成周铎《百济城址研究》（汉江文化出版社2002年）、徐程锡《百济的城郭——以熊津、泗沘时代为中心》（考古学丛书之一，学研文化社2002年），论证了百济城址在制度方面与长安或邺城相似之处。著名历史学家、首尔大学朴汉济教授于2000年12月在《历史学报》第168辑上发表《魏晋南北朝时代各王朝的首都选定及其意义——洛阳与邺都》。

韩国学者对邺城的关注相对较晚，但发展势头良好，越来越多的学者已认识到只有搞清楚中国古都城制的发展，才能揭示出本国古代都城制度的渊源。因此，中、日、韩三国学者都在从各自的方面进行研究，并呈现出合作及共同研究的趋势，欲通过邺城的探讨，找到东亚古都城制的起源。

笔者自1984年涉足邺城研究，撰成《魏晋北朝邺城初探》，赴成都参加全国首届魏晋南北朝史学术讨论会，并被选入文集《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编，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1987年5月与谷川道雄等日本学者进行学术交流，共同踏察邺城遗址。学术交流发言稿《六朝地域社会研究的几个问题》与论文《魏晋北朝幽冀诸州要论——兼谈南北东西形势的形成》刊《日中国际共同研究：地域社会在六朝政治文化上所起的作用》。1988年筹备组织“全国第二届北朝史学术讨论会”，并提交论文《邺城北城建置考》，以后刊于韩国明知大学《明知史论》第14、15合辑（2004年）。1991年撰《建安年间邺下文学作家群》，参加“全国第三届建安文学学术讨论会”，入选会议文集《建安文学新论》（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年）。此外，还撰有《漳河畔邺城故都》（中华书局《文史知识》1990年第7期）、《邺下传统水利工程的变迁》（《河北水利史志论文集》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年版）、《秦汉邺城钩沉》（韩国韩华学会《韩华学报》第3辑，2004年）、《曹魏邺都城制建筑考》（《亚洲学术》2006年，人民出版社2006年）、《邺与中世纪东亚都城城制系统》（《亚洲学术》2007年）、《后赵邺都城制建筑考》（《河北学刊》2008年第3期）等。20多年来从事邺城研究，前后四次踏察邺城遗址。2003年春，以《古都邺城研究——中世纪东亚都城制度探源》为题，申请韩国高等教育财团国际交流项目，并获准于是年8月至2004年8月在韩国首尔开展合作研究一年，得以集中精力将20多年的积累作一系统整理，并补充了许多日文、韩文资料，撰出初稿。回国后，又申请并通过了本项目的后续研究，即《邺城复原研究》。

① 中村圭尔、辛德勇编《中日古代城市研究》，第48—49页。

## 五

其实,邶城研究的意义并不仅仅表现在历史方面,或者说仅限于弄清楚中世纪东亚都城制度的起源,更重要的还在于它的现代科学与艺术价值。古人择都重视天人关系,追求天地人最大程度的和谐,科学合理地利用地理环境和自然条件,将“天人合一”理念贯彻于城市的总体规划与设计、结构布局、职能分区以及不同方位建筑及名称,还包括城市辅助设施如供排水系统、城区内外园林建筑,并通过水陆交通使城市与周围水系及道路交通网络连接成一个体系,这一思想理论对于现代化都市建设仍有重要参考与指导作用。而且邶城建筑施工也十分讲究,先筑宫殿及城内外水利工程,再修城垣,建筑用土取之池渠的开挖,弃土废料等建筑垃圾用于筑台,科学计算施工,统筹兼顾,边建设边绿化,沿沟渠、街路植树,并于近郊建造园林、陂塘,既改善城市居住环境,又可调节城市用水。曹操兴建邶城,十分注意周围生态环境的保护,建筑木材取之上党山林,舍近求远,并构建完善的城内城外水利系统,避免漳水的危害,变水害为水利。他用兵于邶时,曾遏淇水入白沟以通粮道。建安十年,北征乌桓,凿渠以漕运军粮,“自呼沱入泲水,名平虏渠;又从沟河口凿入潞河,名泉州渠,以通海。”<sup>①</sup>十八年,凿利漕渠,“引漳水东入清、洹,以通河槽。”<sup>②</sup>通过人工渠将黄河、海河两大水系连接起来,河运与海运贯通,这不仅改善了邶城周边的生态环境,又便利交通,增强了地域中心城市的吸收与辐射功能。城市建设、发展与环境保护相统一,营造人与自然、资源共生共存的和谐关系。古人并不懂得“可持续发展的理论”,但他们在现实生活中迫于居住环境的改善,不自觉地践行了这一理论。以后,历经后赵、前燕、东魏、北齐,邶城三次兴衰,凡处于兴盛时期,基本上都能注意到人与自然的关系,如果步入衰败时期,人与自然的关系往往处在不协调的状态,传统水利工程废弃,湿地萎缩,气候趋于干燥,物种种群减少,植被劣化,邶地一片萧条景象。研究邶城,不仅可以从中总结城市规划与建设的经验,还可以从中归纳城市与区域经济发展之关系等方面的经验。

邶城制度影响及于明清北京和古代朝鲜的汉城,日本的京都在制度上虽直接承袭唐代长安,但其渊源却在邶城,北京、汉城(首尔)、京都均已发展为现代化都市,甚至国际化大都市,但其城制布局至今保留着悠久传统,老城区南北中轴线,左右对称,棋盘状街区等等,仍然都是昔日的格局,以后新开辟的城区围绕老城区,沿传统城制向外扩展,尽管建筑形式各异,但从根本上讲,都是在传统基础上规划、设计和建设现代化都市。城市的设计者未必都清楚其城制的源流演变,尽管他们在城市建设中拆除了许多古建筑,未能尽保护之责(特别是北京),但他们并不能改变传统的城市制度,否则,真正意义上的北京、汉城(首尔)、京都就不存在了。研究邶城,既可以深刻认识东亚现代化大都市的历史传统,秉承传统,规划、建设这些现代化大都市,还可以使那些生活、工作在这些都市里的人们,或者到这些都市中旅游的人们,步行在街头,切身体验到历史与现实的美妙结合,不仅有生活工作的舒适感,还有深厚的历史文化的愉悦感,丰富并提升人们的精神境界。

在北京、汉城(首尔)、京都、奈良、庆州、水原等城市,还保存着大量古迹,其中一些著名古迹已被联合国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如明清北京故宫、天坛、汉城(首尔)昌德宫、宗庙、庆州王京遗址、水原华城等,这些古迹的建筑理念和制度也都与邶城有关,特别是汉城宗庙制度与东魏北齐邶南城的宗庙颇为相类,这种王室宗庙在中国大陆早已不存在了,而在韩国却完整地保存下来,还有“天上大将军,地下女将军”的部族信仰木柱,也是北齐的遗俗。所有这些,与埃及的金字塔一样,都是人类文明的结晶。这些建筑的性质与布局及礼制礼俗,须从制度方面得到解释,还应从制度沿革方面寻找其源流演变,这都离不开邶城研究。所以,邶城研究对于认识、总结、保护、和利用北京故宫等世界文化遗产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只有看得懂,能充分的理解,才会有自觉的保护意识。

(责任编辑:陈 磊)

① 《三国志》卷1《武帝纪》,中华书局1957年,第1册,第28页。

② 《水经注》卷10《浊漳水》,上册,第952页。

Edited under the Auspices of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 Abstract

#### General Catalogue of Chinese Pedigrees Compiled to Develop Chinese Culture WANG He-ming

This paper records the course of compiling the General Catalogue of Chinese Pedigrees during 8 years and points out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catalogue. More than 600 relevant literature collection units, 1,000 odd compilers and over 5,000 family catalogue collectors devoted selflessly to the compilation of the catalogue. The General Catalogue of Chinese Pedigrees to be published has many advantages and will definitely disseminate the Chinese culture and add to the cohesion of overseas Chinese.

#### Yecheng—The Mystery of City History Research to China, Asia and the World NIU Run-zhen

The system of Ye city was one of the origins of the international ancient “china from” cities. Its standardization, orderliness and symmetry made great influence on many ancient Chinese cities, such as, DaxXng, Chang’ An and Beijing the capital city of Sui, Tang, and MingQing dynasty. In addition, it also made quite impacts on some venerable capital city from Japan, Vietnam, South and North Korea. The site of ye had already been buried in the earth. However, studying with the documents and archaeological information, the city’s original location, the derivation of the city’s name, the geography condition and the great function of the city to the history would be under discuss. According to the historical data and the study from the scholars at all times and in all over the world, the mystery of the ye city would be solved, and the origin of the medieval East Asia capital cities could be found out. At the same time, some historical experiences betwee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ities and the protection of environment could be learned from the ye’s triple up and down. Today, the modern cities would be pleased to use it for reference.

#### Brahmanism and Its Disciples in Tang Dynasty

YAN Yao-zhong

Based on investigation into the difference between disciples of Brahmanism and monks under the family name of Brahman, the paper argues that Brahmanism can exist as a kind of religion in Tang dynasty, just like Jing Religion and Xian Religion.

#### A New Study on the Five Kinds of Greatnesses of Manichaeism

MA Xiao-he

We compare the Psalm of the Bema CCXXIII of the Coptic Psalm – Book, the Sogdian cosmogonic text M178, the verses from Mani’s Psalm “The Praise of the Lesser Ones” with § § 122 – 123, 356 – 357, 387 – 389 of Chinese Hymnscroll. It is clear that the Five Kinds of Greatnesses in Manichaean Chinese materials are: the Lord of constant Light in the Light – World (明界常明主 = Father [pydr]), the Twelve Eternal – abiding Kings of precious Radiance, the numerous Worlds and many Countries, the unique wonderful fragrant Air and the precious Land of Diamond naturally admirable. The consistence of the doctrine “The Five Kinds of Greatnesses” in the Western and Eastern materials let us believe that it belongs to the core doctrines of Mani.

#### Foreign Culture and Local Custom: on the origin and change of Lantern Festival in Tang Dynasty

ZHU Hong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origin and change of the Lantern Festival that was celebrated on January 15 according to the Chinese lunar calendar in Tang dynasty. Based on the study of relevant literature, it